

仪式、秩序 与边地记忆

民间信仰与清代以来
堡寨社会研究

张月琴 著



科学出版社

山西大同大学基金资助

仪式、秩序与边地记忆

民间信仰与清代以来堡寨社会研究

张月琴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依据大量的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考察了清代以来长城沿线堡寨聚落民间信仰的历史地理环境、民间信仰的神灵体系、庙宇祀神,分析了边地民间祀神的地域特征,论述了民间信仰仪式与边地社会秩序建构、民众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从而试图探索长城沿线堡寨聚落民间信仰的概况、特点和历史根源。本书中依据田野调查绘制而成的图片,更是形象地展现了清末和民国时期堡寨聚落的风貌。

本书可供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相关研究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仪式、秩序与边地记忆:民间信仰与清代以来堡寨社会研究 / 张月琴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03-036210-0

I. ①仪… II. ①张… III. ①信仰—民间文化—研究—大同市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4897 号

责任编辑:郝莎莎 王昌凤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2

字数:300 000

定价:1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序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边塞文化的书，研究的对象是长城沿线的堡寨聚落，即作者所谓边地者，研究的内容是融于边地记忆中的民间习俗、民间信仰，以及承载这些习俗和信仰的诸多仪式和秩序。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在学术界还是一个新的话题。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我走出大学校门经过一年“再教育”后，第一步便踏在了当时山西大同北山区的土地上，也就是该书所谓大同北部沿边地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长城古堡，公社所在地堡子湾，南面 4 公里是宏赐堡，北面 6 公里以外是得胜堡、镇羌堡，西北 10 多公里是拒墙堡。堡子湾虽然无堡可寻，但也没有离开一个堡字。

明代以前，这些堡、城的情况难明底里，但是它们与身边古长城的共生共长、同忧同戚却毋庸置疑。有人说，得胜堡的蔡姓居民是某一位蔡将军的后裔，民国鼎革时才停发了皇家的俸禄。其实这里的堡民并不全是明清将士的遗绪，得胜堡的何姓、贺姓、曹姓、米姓与中世纪西来的粟特昭武九姓并不是毫无关系，李姓、朱姓也应与李克用的祖上突厥沙陀部朱耶氏有着这样那样的牵连。

我在堡子湾的七年半、新荣镇的六年半，正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初。此时民间的庙祀活动已基本废止，但不仅是形而下，而且是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仍在延续和昭示着千百年的记忆。令我深有所感的是边地城堡村寨的三种庙，为首的是龙王庙，其次是关帝庙，再就是曹奶奶庙。龙王庙与边地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沿边地广人稀，十年九旱，无霜期只有 110 多天，完全是靠天吃饭，在龙王庙祭神祈雨差不多是边民们每年都少不了的程序。于是不仅是大堡有庙，小村也有小庙。边地的关帝庙已不全似内地仅有祈雨磨刀的功能，而主要是边民们集市贸易的所在。明朝王崇古、方逢时在得胜开关，马市就设在得胜、镇羌二堡之间的关帝庙前。20 世纪 70 年代，镇羌的支部书记（后为公社书记）岑玉山曾带我在口内口外关帝庙一带走了一遭，虽然庙已不存，但宽敞的芳草路，横躺竖卧的石狮子、拴马柱仍在叙述着当年的繁华。岑书记说，他的祖上就是从右玉杀虎口调到得胜口给交易马匹打火印的税收人员。边地的曹奶奶是我在家乡太原地区未曾见过的。边民中的曹姓多为“西来贾”，这位外来的曹氏奶奶能够取代中原的碧霞元君成为边民们求子求福的神灵，其中必有缘故。由于战事频仍，添丁加口成了边民们自身生产和战事、耕作的的第一需求，于是便有曹奶奶出来与送子观音共同承担这一神圣职责。书中作者多次提到边地多民族融合带来的人口优化问题，

这已为隋唐成批优秀人才涌现从而成就了隋唐盛世所证明。人口优化还带来了大同女性的丰神健美，某一清代笔记中有“蓟镇的城墙，宣府的教场，大同的婆娘”的说法。大同姑娘天生丽质，并且有识文字、习乐舞的传统，当时的京城歌伎许多就是来自大同。大同民间有一个四月十八倾城踩青、妇女赛脚的习俗。赛脚、赛鞋说到底是赛人。

关于踩青，大同出土的唐天宝七载（748年）的《梁秀墓志》说，塞上之人以御侮为务。境披烽烟的特殊环境，养成了他们气吞胡虏的豪迈情怀。牧民无大无小，无强无弱，都是利剑在腰，弓弦在手。但每逢战事间隙，特别是雪化春萌之时，大家都分享着和煦阳光的抚慰，在一平如砥的草原上骑马奔驰，在街市帐幕间游猎。不仅是边民，也包括守边将士，无不乐而忘忧，就连果毅都尉梁公也会混杂在欢快的人群中，脚踏着芳草，享受着人生的乐趣。

这样的活动仪式，应该与今天的初春踩青有关，也应与早先打了胜仗，军民围绕祭坛狂歌奔舞以及古老的胡腾舞、胡旋舞和化装舞等“傩戏”有关。如今边民们仍可拿出手的赛戏以及往日被蔑称为“王八”、“二贼”的乐户和乐舞人也有着特殊的历史传承和地域性。

汉代班固、班超的祖上名班壹（大同附近班氏县人），在武州塞帮助汉军引诱匈奴的马邑富商叫聂壹。现在朔州地面为儿子命名仍惯用“一”字，俗谓贾一、贾二、贾三、四虎旦。这与边民们简约的习性有关。有些姓名则像镜子般反照出边民的性格属性，如张武、李武、谷兆勇，与边事有关；郭日亮、王日雄、张日明等则反映了边民的太阳崇拜。

以上我只从历史传承的角度在宏观上粗线条地讲了边塞、边堡、边民们的一些信仰、习性和风情。至于微观的展开以及边地这些特有的仪式、秩序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意义，则要靠读其文观其图去寻绎。

殷 宪

2012年7月5日于归真堂

目 录

序	殷宪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民间信仰研究综述	2
一、对民间信仰的认识	2
二、民间信仰研究现状与趋势	4
第二节 堡寨聚落与民间信仰研究的意义与构想	9
一、堡寨聚落研究的意义与现状	9
二、堡寨聚落与民间信仰研究的构想	10
第二章 长城堡寨的“边地”性质	13
第一节 大同长城与堡寨	13
一、大同长城与堡寨概况	13
二、新荣长城与堡寨	14
第二节 大同北部堡寨的历史演变	21
一、明代边堡的修建断断续续	21
二、蒙汉互市加强了城堡的商业职能	23
三、清代堡寨军事职能降低, 经济职能加强	24
四、清末至民国时期堡寨成为普通村落	28
第三节 以堡寨聚落为中心的边地社会	30
一、边地及其特征	30
二、大同地区的边地性质	31
三、大同北部更是边地之边	34
第三章 堡寨中的众神	36
第一节 家庭祀神	36
一、祖先	37

二、家庭其他祀神	37
三、仓神、场神	42
第二节 堡寨庙宇及其祀神	43
一、庙宇的分布	44
二、主要的庙宇及其祀神	49
三、其他庙宇及其祀神	61
第四章 堡寨社会民间信仰的地域特征	67
第一节 堡寨社会民间信仰的祀神特征	67
一、城隍坐镇，土地退位	67
二、武神众多，文昌不昌	70
三、敬鬼与惩鬼习俗并存	70
四、国家正祀神灵民间化	72
第二节 女性神灵地位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形貌	73
一、司雨众神与龙母	74
二、奶奶庙众神和曹奶奶	75
三、女性祀神体系反映的社会形貌	78
第五章 民间信仰仪式与堡寨社会秩序	83
第一节 年节仪式与家庭秩序	83
一、年仪式	83
二、节日仪式	90
三、年节仪式的特征	95
第二节 赛戏仪式与堡寨内部的社会秩序	97
一、大同“乐户”溯源	98
二、近代乡村的赛戏仪式	100
三、仪式的目的：乡村社会的秩序化	102
四、仪式背后的思考	104
第三节 祈雨仪式与堡寨在边地的地位	106
一、祈雨的对象：龙王及其他	106
二、祈雨的步骤：唱戏、祷雨、取水、出马	108
三、堡寨权威的建构	111
第四节 仪式与边地社会秩序	114
一、仪式体系构成的秩序层级	115

二、仪式的边界和仪式的空间	116
三、仪式表达的国家控制	117
四、仪式界限的突破与重构	118
第六章 民间信仰与边地社会生活	121
第一节 民间信仰与边地民众生活	121
一、民间信仰与边地民众的人生历程	121
二、民间信仰与边地民众的社会生活	128
第二节 民间信仰与边地蒙汉民族交往	135
一、明代马市、私市到清末大同府商业状况	136
二、以堡寨为中心的庙会	145
第七章 堡寨记忆与民间信仰的复兴、演变	152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堡寨的民间记忆	152
一、政府和民众对堡寨历史的认识和宣传	153
二、碑记和民间传说中的城堡与庙宇	155
第二节 民间信仰的复兴与演变：基于破鲁堡的个案分析	156
一、破鲁堡的仪式与庙会	156
二、对民间信仰仪式复兴的分析	159
第八章 结语	164
第一节 边地概念对于长城文化研究的意义	164
一、从怎样看待长城、城堡和长城文化谈起	165
二、边地蒙汉交往的特征	167
三、文化多元化的边地呈现	168
第二节 文化空间视阈下长城古堡的保护与开发	169
一、长城古堡的文化艺术资源	170
二、长城古堡的保护与开发	172
参考资料	175
后记	181

第一章 绪 论

在对山西省大同市长城沿线的堡寨聚落进行田野调查时，笔者想到了《明史》中多次出现的一个词：边地。用“边地”一词来描述明清时期长城沿线地区，更能体现长城文化的深刻内涵。以此作为大背景来考察明清时期长城沿线的地方社会，可以透视明清时期长城沿线地区，特别是堡寨聚落的地位变化，也可以了解长城文化形成和演变的历程。

本书的主要视角是民间信仰。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突破口，是因为民间信仰是中国民间社会主要的信仰模式。可以毫不怀疑地说，相当数量的中国老百姓有某些民间信仰或某些信仰活动的实践。在很多的时间和场景里，民间信仰一直存在并表达着民众的生活，反映着民众的生活方式。比如，去寺庙、祈祷、烧香、在家中供奉神像或祖先牌位，戴符、看风水、算命，等等。我们可以通过民间信仰来考察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传统乡村社会里，民间信仰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民间信仰基本上能够适应传统乡村社会的需要，对传统社会的身份认同、族群凝聚、生态稳定、生活和谐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繁芜的民间信仰仪式中，固定的场所、一致的价值取向和情感认同，是乡村社会秩序在民众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内化。在现代乡村社会里，与民间信仰相关的庙会和仪式的恢复，是地方性知识的现代演绎，在推动民众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再认识的同时，也增加了民众对地方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以民间信仰为突破口，考察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审视改革开放以来民间信仰的复兴和演变，正确认识民间信仰的价值与作用，为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借鉴，正是本书写作的初衷所在。

第一节 民间信仰研究综述

一、对民间信仰的认识

什么是民间信仰？这是进行民间信仰研究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关于这一点，众多的学者从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角度对民间信仰展开了研究，提出了自己对民间信仰的看法。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对民间信仰的看法大致分为两种。有的学者认为民间信仰是流传于民间的，同数派信仰的宗教并列的一种宗教。具体来说，中国古代在儒、释、道之外存在着第四种宗教，即民间宗教，而“民间宗教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派信仰的宗教，如白莲教、一贯道等；一是流传于民间的为普通民众所共同崇信和奉行的宗教戒律、仪式、境界及其多种信仰”^①。大多西方汉学家则强调中国民众信仰行为的宗教体系性及草根性（非文本性），认为它独立地存在为一种“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其内容主要包括：“（1）神、祖先、鬼的信仰；（2）庙祭、年度祭祀和生命周期的仪式；（3）血缘性的家族和地域性庙宇的仪式组织；（4）世界观和宇宙观的象征体系。”^② 神、庙、仪式及象征，是民间信仰的四大组成部分。

在笔者看来，民间信仰是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有关神灵崇拜的观念、行为、禁忌、仪式等信仰习俗惯制的总称。它没有明确的教义、戒律及组织系统，是人们日常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民间信仰又不仅仅是精神生活的存在。正如西方汉学家强调的那样：民间信仰包含流行在中国民众间的祖先、神、鬼的信仰和祭祀；庙祭、年节祭祀和生命周期仪式；血缘性的家族和地域性庙宇的仪式组织；世界观和宇宙观的象征体系。这一系列的文化现象使民间信仰的神灵、仪式和象征体系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民间信仰与世俗生活密不可分，伴随着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民众的生命息息相关，没出生时祈求送子观音，出生后求助各方神灵保佑，颇类似于

① 欧大年：《解读辽宁民香，解读中国民众宗教意识》，见侯杰、范丽珠：《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序。

②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52～156页。

原始巫术和万物有灵论；另一方面，民间信仰在神灵的系统化、仪式的程式化和禁忌的趋同化等方面，又与宗教现象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间信仰属于非官方文化，它涵载了大量的远古人类既有的信仰观念及信仰仪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它源自民众的思想意识，却又时时关照着官方的态度，在和官方意识体系的冲撞、交融中，完成它的演变与生长。

作为一种信仰文化，民间信仰有着丰富的内涵，保存着传统文化演变过程中积淀的内容。民间信仰重在实践，较少地利用文本并以地方的特色传承着，如语言的地方化、仪式的地域化等。同时，它根植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并由社会中的多数民众支撑，与民间的生活密不可分，其仪式和活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作为一部文化发展史，民间信仰源自中国社会历史，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及其他地方神灵崇拜为核心，没有统一的信仰体系和宗教经典，具有地域性、分散性、自发性、民间性。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事实，民间信仰受到地方政府、百姓的喜欢，在作为基层社会人际交往的价值内容、激活地方经济、整合生活方式，甚至规范人生世界观、建构生命意义等方面，已经深刻地建构了其基本的社会文化合法性。

作为一种民间叙事形式，人们能够基于民间信仰建立起底层社会的基本共识，体会出人之为人、神之为神、社会之为社会的共同价值纽带，借助于民间信仰的实践与表达方式，呈现一个底层社会、人际交往、善恶规范的运作模式。

在传统社会，民间信仰是社会的主要纽带。特别是在乡村社会中，人们大都加入一种自愿设置的民间信仰组织或民间信仰团体——“社”或“会”。社首或会首往往由乡村政权的负责人担任。民众在社首或会首的组织下带领民众完成一系列与民间信仰有关的活动，诸如祈求神灵保佑、祈求风调雨顺、攘除灾疫或答谢神灵等。在民间社会，信仰的社会组织不仅成功地组织实施了信仰仪式或祭祀活动，而且增强了人们的地方认同感，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维护着基层社会的合理秩序，实践着底层社会伦理的稳定或传承。

在现代社会，民间信仰是中国民间社会神圣性的非程式化的宗教表述，它的基础是民间社会与文化建设。民众实践自己的信仰的过程就是寻求真实关怀、彼此认同、建构诚信的过程。建构民间社会信仰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保卫名副其实的民

间社会,进而将民间社会道德与公民社会道德的双重建设统一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民间信仰又与构建和谐社会紧密相连,与民间信仰相关的庙会、仪式的恢复,重新演绎民间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并赋予了其新的文化含义。现在村落组织的领导者,也乐于将民间信仰中反映传统文化的庙会或仪式加以恢复,并将其与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或乡村道德的塑造相关联。民众在民间信仰仪式和庙会中,感受到古老的传统,同时获得了对民间历史的再认识。而庙会或仪式中优秀民族文化的展演,增加了民众的地方认同感和自豪感。

二、民间信仰研究现状与趋势

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著作颇丰。19世纪末,荷兰籍的汉学家德格如特便已依据福建民间的调查写成《中国宗教体系》(1892年)一书。他把民间的信仰和仪式与古典的文本传统相联系,认为民间信仰体系是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实践内容,是一个系统化的宗教。^①在功能主义风行的19世纪20~50年代,社会人类学界把中国民间仪式看成与宗教具有同等地位和功能的体系。例如,社会人类学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他的《宗教与社会》(1945年)一文中花了较多篇幅谈论中国宗教的特性。他认为,中国古典的哲学家和官员对宗教的社会功能给予极大的关注,他们认为合乎规范地举行仪式是社会赖以维系自己的秩序的关键,这种看法在民间被广泛接受。布朗进一步认为,中国人对仪式的重视,不仅证明中国宗教的主要内涵是仪式,而且为理解世界上的所有宗教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在他看来,因为宗教的支柱是仪式而不是信仰,因此不管是文明社会还是原始社会,仪式可以作为宗教体系加以研究。韦思谛主编、陈仲丹译的《中国大众宗教》(2006年)一书认为,在中国,除了儒、道、释三家主流宗教外,还存在着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大众宗教,这些通常不被重视的草根信仰,在历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影响。书中收录了韩书瑞、杜赞奇、彭慕兰等的9篇文章,有的基于一手的田野调查,有的基于详备的历史文献,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考察了天后(妈祖)、关帝、碧霞元君、五通神等崇拜,使读者得以了解中国古代信仰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及这些信仰在

^①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54页。

中国古代民众中的影响及其所具有的文化意蕴。杜赞奇在研究中国华北农村时则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试图以此揭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多种途径和方式，并且认为民间信仰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渠道（《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日本的滨岛敦俊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对明清时期江南城隍信仰及李王、金总管等江南土神进行了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民间信仰的发展变化与江南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关的，并且“当时的江南农村社会并不仅限于江南地区而与更广泛的世界具有联系”^①。港台学者林美容也有著作问世^②。

在国内，20世纪初，众多学者就从革除社会弊病的角度对民间信仰予以关注。1922年《东方杂志》设立“迷信的研究”专栏。1929年，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在一年之中共刊载民间信仰类研究文章及资料90余篇。有关民间信仰的实地调查也相应展开。顾颉刚先生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的方法，对北京妙峰山香会、东岳庙，福建泉州的铺境，广东东莞的城隍庙等作过初步的研究。他通过研究民间文化中的神道与社会，“很愿意把各地方的社会和仪式的目的弄明白了，把春秋以来的社祀的历史也弄清楚了，使得二者可以衔接起来”^③。费孝通先生则在《江村经济》中对开弦弓村的民间信仰活动加以留意，探讨了灶王、刘皇等“神道”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些实地调查是民间信仰研究的典型范例。一些文化史学者对中国古代民间信仰问题也表现出了兴趣，如柳诒徵先生便撰有《述社》一文，对古代中国“社”之源流演变加以条缕剖析。许地山也著有《扶箕迷信底研究》（商务印书馆，1941年）。此外，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论述还散见于当时不少关于民俗及社会风俗的论著之中，如张亮采编著的《中国风俗史》（商务印书馆，1911年），胡朴安主编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年）等。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信仰被简单化为“封建迷信”而加以否定，与之相关的民

① [日] 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农民信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近代江南海神李王考》，见张炎宪：《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8年；《明清江南农村的商业化与民间信仰的变质——围绕“总管信仰”》，见叶显恩：《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② 林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湾民间社会的地域构成与发展》，见张炎宪：《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8年。

③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1页。

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在中国内地几乎绝迹，民间信仰研究再也无人问津。

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李乔的《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宗力和刘群的《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金泽的《中国民间信仰》（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宋兆麟的《巫与民间信仰》（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姜彬的《吴越民间信仰习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何星亮的《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王景琳和徐陶的《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乌丙安的《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徐晓望的《福建民间信仰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林国平和彭文宇的《福建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汪毅夫的《客家民间信仰》（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林国平的《闽台民间信仰源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林继富的《灵性高原——西藏民间信仰源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范荧的《上海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著作，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存在方式，诸如神灵谱系、历史源流、作用功能、文化特征，等等。程民生著有《神人同居的世界——中国人与中国祠神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对神祠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及影响作了较全面的研究。侯杰、范丽珠的《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修订版）一书则立足于近代，对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发展演变寻根溯源，进行较为系统的勾勒，阐发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典型特征。郑振满、陈春声主编的《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一书，通过描述相互重叠、动态的信仰空间的演变过程，以及信仰空间所蕴涵的权力支配关系和“超地域”的社会心理内容，进而探讨民间信仰所表达的百姓关于国家与王朝的观念。王铭铭主编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一书，对民间信仰作了人类学考察。民间信仰成为全面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和普通百姓的一个独特视角。

与此同时，陈春声对广东樟林“三山国王”与“双忠公”信仰进行研究^①，赵

^① 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明末东南沿海社会重建与乡绅之角色——以林大春与潮州双忠公信仰的关系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正统”神明地方化与地域社会的建构——潮州地区双忠公崇拜的研究》，《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世瑜对明清北京城内碧霞元君与东岳神崇拜进行研究^①，吴建华对清初江宁巡抚汤斌毁五通神事件进行剖析^②，王健对苏州民间信仰做了考察^③，罗一星对明清佛山北帝崇拜进行研究^④，郑振满以莆田江口平原为例探讨当地神庙祭典的发展^⑤，刘志伟对粤东沿海的一个海岛——大洲岛的乡村庙宇、祭祀习惯及村落关系等进行实地考察^⑥，钱杭对浙江平阳地方神庙薛忠训庙（大夫殿）做了研究，等等^⑦。杨念群、傅建成等对区域性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均有问世^⑧。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考察民间信仰与社会秩序、民间信仰与社区活动及其内部规则；或者考察民间信仰的仪式，把民间信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使民间信仰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和信仰研究领域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

华北的民间信仰研究，除赵世瑜、杨念群外，王守恩著有《诸神与众生——清代、民国山西太谷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依据各种文献资料 and 大量田野调查资料，借鉴宗教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清代、民国时期山西太谷的民间信仰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阐明了该信仰的大致情况、一般特点与地方特色，论述了其与佛教、道教、国家意识等大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复杂关系，并分析了该信仰在乡村社会的地位与作用，对其与传统乡村社会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关系作了总结。笔者所见还有苑利的有关龙王信仰和祈

① 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② 吴建华：《汤斌毁“淫祠”事件》，《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③ 王健：《明清以来江南民间信仰中的庙界：以苏、松为中心》，《史林》，2008年第6期；《明清江南地方家族与民间信仰略论——以苏州、松江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明清江南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日常生活：以苏松为例》，《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多元与差异：苏州与徽州民间信仰比较》，《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④ 罗一星：《明清佛山北帝崇拜的建构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⑤ 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史林》，1995年第1期。

⑥ 刘志伟：《大洲岛的神庙与社区体系》，中国社会史学会1998苏州年会论文，苏州：苏州大学历史系，1998年。

⑦ 钱杭：《忠义传说、祭祀圈与祭祀组织——浙江省平阳县腾蛟镇薛氏忠训庙的历史与现实》，《史林》，2002年第2期。

⑧ 杨念群：《民国初年北京地区“四大门”信仰与“地方感觉”的构造——兼论京郊“巫”与“医”的近代角色之争》，见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傅建成：《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农家庭的宗教信仰》，《历史教学》，1995年第2期。

雨仪式的一系列文章,如《华北地区祈雨活动中旱魃与斩旱魃仪式》(《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华北地区龙王庙配祀神祇考略》(《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华北地区龙王庙主神龙王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华北地区祈雨仪式中的男性社会组织》(《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华北地区龙王庙壁画中神灵世界的组织》(《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介绍了华北地区的龙王信仰和祈雨仪式,以生动的事实、严谨的论辩,阐述了雨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龙王崇拜及其信仰仪式。王建革在《近代华北乡村的社会内聚及其发展障碍》(《中国农史》,1999年第18卷第4期)中指出,农民的祈雨、敬蝗神等民间信仰行为是其对环境的一种反映,这种民间信仰网络对乡村内聚的负面功能破坏了乡村建设。江沛的《近代华北城乡民间信仰述评——以冀东诸县为例》(《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一文,把冀东城乡的民间信仰放置于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指出了在传统与现代性间不可逆转的变化。尹国蔚的《妈祖信仰在河北及京津地区的传播》(《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8卷第4辑)指出,妈祖信仰在元、明两代随南粮北运传播而来,并对元、明两代的差异进行了对比。王永平的《论唐代山西的民间信仰》(《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27卷第1期)对文献进行了梳理,详细论述了唐代山西民间信仰的具体内容及其特点。李文慧的《民间信仰与村落关系》以山西太谷民间信仰为例,探讨了民间信仰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乡村基层社会运行状况,以及村落关系的建构过程。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于2005年立项,由山东大学获得。“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区域探索,在华北地区主要选择了山西、山东、河北、天津等区域进行调查。山西境内的调查主要针对五台山。

从上述研究状况来看,对民间信仰作纯粹的史学研究的学者较少,大多数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注重对个案的剖析。在研究的区域上,也呈现南多北少的现象。从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华北、东北、西北的民间信仰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民间信仰研究区域的进一步拓展,有望出现对整体区域内、较长时段的民间信仰研究著作。

第二节 堡寨聚落与民间信仰研究的意义与构想

一、堡寨聚落研究的意义与现状

本书中的“边地”主要指大同北部的长城沿线堡寨聚落。“聚落”(settlement)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为“人聚居的地方”以及“村落”。它一般分为乡村聚落与城市聚落两大类。乡村聚落即村落,是较常见的人类生活领域的居住环境,其居民以农业为经济活动主要形式的聚落。城市聚落,即规模大于乡村和集镇的以非农业活动和非农业人口为主的聚落,是体现鲜明政治气氛和社会等级关系的聚居环境。大同北部长城沿线的堡寨是明王朝为抵御蒙古族频繁南下而修建的,至清代蒙汉合为一家,之后多转为民用,成为村堡。这些堡寨能够满足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需要,是聚落的一种。除此之外,它还兼具较强的防御特性,是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设防聚落。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同北部的堡寨聚落的城墙多数被拆毁,堡内的部分居民也逐渐搬迁到堡外居住。但是,从空间属性上看,聚落不仅是满足生产、生活活动的功能空间,而且也是反映某种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社会空间,进而又是反映聚落群体共同信仰和行为规范的意识空间。^①大同北部的堡寨聚落曾经是一种在相关的生产与生活活动中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不仅能满足生产、生活活动,而且还反映堡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从而体现堡寨聚落群体的共同信仰和行为规范。

目前对于聚落这一概念的应用多见于建筑学和历史地理学领域。关于堡寨聚落的研究现状已经由这两个领域的相关论文作了综述,在此不再赘述。下面仅对中国北方堡寨聚落的研究状况作一介绍。

关于中国北方的堡寨聚落的研究,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北方堡寨聚落研究及其保护利用策划”,主要是从建筑学角度对堡寨聚落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剖析。王绚、黄为雱、侯鑫的《山西传统堡寨聚落研究》(《建筑学报》,2003年第8期)一文,选择曾经广布堡寨而今天依然留存有丰

^① 周若祁:《韩城村寨与党家村民居》,西安:陕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第3页。